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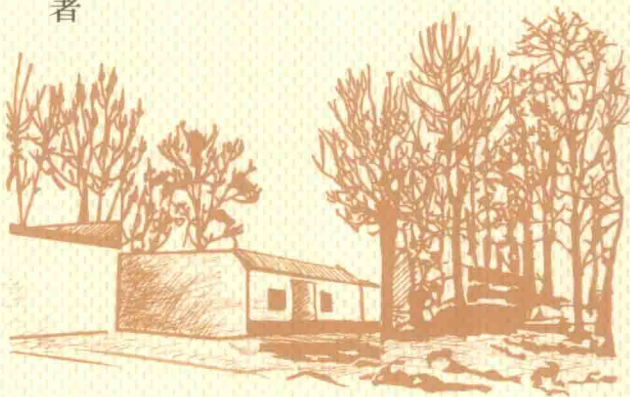
GUORIZI:

The Narratives and Ethics
of Peasants' Daily Life
in the Guanzhong Plain

过日子： 农民的生活伦理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陈
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过日子： 农民的生活伦理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GUORIZI

陈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陈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097-8416-7

I. ①过… II. ①陈… III. ①农民-生活状况-研究-
陕西省 IV. ①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267号

关中农村研究系列丛书

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著 者 / 陈 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02千字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416-7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付少平

编委会副主任 张忠潮 朱宏斌 赵晓峰

编委会委员 付少平 樊志民 张忠潮

朱宏斌 杨学军 赵晓峰

郭占锋 赵 丹

丛书总序一

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 抱负应该肯定

——在第一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郑杭生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 5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探讨。重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学者的踊跃参与，也要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领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我们基金会一起主办这次“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

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了建校 80 周年暨合校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80 年的风雨，80 年的沧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 985、211 序列的农业院校，服务三农发展，也应该成为学校各文科院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人文学院刚刚改名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校还将农村社会发展确定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这说明学校非常重视中国农村研究，重视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已经组织中青年教

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通过中心编辑的小册子，可以看到，学院的这批年轻人非常活跃，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批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学校、学院的扶持下，打造农村社会研究的关中学派，抱负很大，热情也高，还很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学会 2014 年 7 月召开的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我在致辞中指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虽然起点不算高，但是中心的老师们从一开始就有心想做成一个学派，确实不容易，应该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

围绕这个问题，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三点意思。

首先，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什么样的学派。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关中地区的历史名人，关学创始人，也是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横渠先生——张载。早在北宋时期，他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派，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汲取理论资源。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快速发展，总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更在加速转型，这是我们所处的大背景。民族的崛起，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学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央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一遇的好机会。然而，中国学术要有话语权，就需要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出我们的声音，营造学术生长的空间。照搬西

方的理论是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必须要逐渐发展起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又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扎根中国改革经验，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

其次，就如何做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我想说一些我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重要的农村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目前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依托的农村经验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比如华北农村、东北农村、华南农村、长江三角洲、湖北中部地区等，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就为西北地区的农村研究创造了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是传统中国小农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因此，扎根田野，立足关中，面向西北地区，定能做出一批有影响力、有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学院提出创建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很有希望，也很有远见。

2013年7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贵阳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题为《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的致辞。这里的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造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中国学派。

2014年我在《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中，对什么是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做了进一步拓展，归纳为“三再、两气、一追

求”。“三再”，就是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两气”就是指“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社会学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这里的“真”指的是科学性，“善和美”指的是人文性。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气神。事实表明，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

可以这样说，今后中国社会学界的良性学术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方面基本功的功力如何，能否在掌握有关事实资料的基础上，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分析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能揭示世界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又能展现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中国经验，通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通过接现实中国、历史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通过把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这三种基本关系，鉴别各种思潮，从而推动中国学派的建设，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并为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2014年在陕西遴选了10个县30个村作为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长期的固定观测点，听说将来还要在其他省市建立类似的观测点。只要能够长期坚持，立足关中这片土地，有理论自觉的精神，练好基本功，一定会有所成就。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情况。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资助了34个博士生项目、30个硕士生项目，还资助了90位青年学者。其中，青年学者项目，2013年就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赵晓峰博士，2014年又有学院的陈辉博士。青年学者项目，连续三年，每年都有

110~120位青年学者递交论文，我们每年从中选出30篇，应该讲这些论文的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三次论坛都非常成功。

另外，我们还创办了两个刊物——《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到目前为止，《社会学评论》已经出了10期，上了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C刊”。《社会建设》也在2014年3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2014年出创刊号和第2期。《社会建设》范围很广，现阶段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重点。这两个刊物是我们社会学界共同的、持久的平台，这两个杂志的一个宗旨也是为青年社会学者搭建一个茁壮成长的学术平台，大家有合适的稿子也可以投给我们。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两个学术刊物，一定能够办成高质量的学术刊物。

预祝这次论坛开得成功，大家都有收获！

谢谢各位！

2014年9月20日

丛书总序二

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付少平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其提及“关中”40余次。现在的关中地域，一般依据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穡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在此兴衰更替，这都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而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有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等，有影响的研究唯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虽对关中地区多有涉及，但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

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在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钞晓鸿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他的研究发现针对一般所认为的商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的情况，“不置田地”却在陕商中极为普遍，无论是陕商购置田地的数量还是购置田地的商人人数，均较微少。“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富商非但没有兼并土地，甚至连自家原有的土地也懒于经营。”这与关中农村“慎终追远及家族聚居观念并不强烈”有关，“明清关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家谱、祠堂、族田的相对稀少”。“宗族势力本身的相对衰弱便为其他组织与势力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关中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人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商人参与地方治理，“宗法共同体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遏制个体的独立性，将每一成

员均融到大家共同发展的步伐之中，这又不能不引起商人的反对”，因此关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关联，认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治类型有所不同，“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家户型和小亲族型等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种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它可以调解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

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地域性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 21 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赵晓峰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庙会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观点。2014 年，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

社会研究中心参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郑杭生先生还特别为中心留言：

关中学派传统深，
横渠四句是经典，
西北农研待继开，
青年才俊勇担当。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套丛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研究的成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研究和农村研究的新天地！

2015年9月

序

贺雪峰

不记得是 2003 年冬还是 2004 年春，在武汉工程大学读大四的陈辉来华中师范大学找我，说想报考我的研究生。当时具体谈了什么，我也没有印象了，只是记得陈辉的单纯和他对学术有热爱。他还送我一本吴思写的《血酬定律》，应该是他刚看过，被吴思震撼到了。

2004 年 9 月，陈辉到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政治社会学硕士学位。与他同年级的还有吕德文、郭亮、张世勇、杨华、欧阳静、田先红等人，现在他们早已博士毕业，都在大学教书并带研究生了。

2004 年年底，我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但我依然主持陈辉他们这一级政治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读书会，每个月一次，地点在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我还住在华中师范大学，晚上读书会结束后，我与同学们一起从华中科技大学步行回华中师范大学。当时途经的鲁巷还近乎农村，路上还有农田，现在这里已经是武汉地区最繁华的地段，是新建的武汉光谷的中心。鲁巷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陈辉在这十年间也不断地蜕变。硕士期间，他真正静下心来读了三年书，之后到海南师范大学当了三年老师，后到上海跟随曹锦清教授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曹老师是我们的精神领袖。2004 年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就是听从曹老师“不要离开武汉”的忠告。曹老师学问高深，为人也极好，睿智而包

容。陈辉在曹老师指导下完成了《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这篇博士论文，并在2013年顺利通过答辩，此后入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此书正是陈辉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陈辉硕士期间的阅读，博士生期间的调研与思考，以及他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善良，都在这部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他选择在陕西关中农村进行为期半年的驻村调研，从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的善良，对农民具有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以至于我不止一次批评他在论文中带入过多的个人情感，而没有做到冷静中立。长期从事农村调查，长期接触农民，感情带入问题也许是缺点，却是一个可以理解甚至令人尊敬的缺点，因为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最重要的是陈辉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来的细腻和深刻，他从农民家庭关系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家庭经济再生产和生命意义再生产四个方面展示了农民过日子的逻辑，许多地方都有精到的表述和出人意料的发现。

我深信，陈辉的善良，他在研究生期间所受的阅读训练，以及他从曹锦清教授那里获得的对农村深入细致观察的能力，这些品质不仅对他教书育人大有帮助，还有益于他产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成果。

期待陈辉的学术研究更上层楼。

是为序。

2015年11月14日晚

前 言

本书从“过日子”角度切入农民生活伦理研究。“过日子”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士大夫希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小农而言，生活中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齐家”这一环节，因为“养家糊口”并非易事。

“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义问题。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追求，人们在面对波折、苦难和各种危机时，才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所谓安身立命，确切地说，只有“立命”，才能“安身”。

农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血缘，另一个是地缘，二者共同构成了农民生命意义的坐标系。（1）中国人说，既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祖先—我—子孙，构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序列。男性依靠这个序列找到“存在感”，女性又通过婚嫁融入男性家族序列而获得“归属感”。（2）村落社会在农民生命意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熟人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面子”和“名声”既规范着村民的行为，又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

总之，“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是农民生活模式的两个内核，前者对应“为何活”，后者对应“如何活”——这两个被古今哲学家争论了数千年的玄妙问题。中国农民的问题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好好过日子”。

肯定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是中国人生活伦理的重要特点。执着于“当下”，有利于调适“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价值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圣即俗，俗即圣，活在当下，过好每天的“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均衡性，“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书的研究资料来源于陕西关中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家庭观念，依然实践着一套以“过日子”为核心的生活伦理。这既可归因于关中农村强大的小农经济传统，亦可理解为西部农村社会变迁速度小于东部农村，所以留存了更多的小农生活传统。关中农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传统农民生活伦理的场域。

本书副标题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六个字，主要是用来说明笔者的研究方式。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农民“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在调研过程中，我特别乐于记录农民的原话，不仅要听他们“说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怎么说”。这些坦诚的表述，更能表达人们意识深处的价值观念。

农民生活在自己的日常世界中，对许多问题可谓习以为常。访谈目的之一，就是设置一种情境，连续发问、解答和追问，不断地刨根问底，用一系列“问题”启发农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基于访谈法的调查研究，访谈对象是更为重要的研究主体。本书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当地人思想的表达。许多时候，我只是扮演了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而已。

我的写作目标并不是对农民生活伦理形成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一个个“文本”时，有自己的体会、理解和判断。书中讲了许多“常识”，并不会给人以理论冲击力，但正是这些常识，维系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都市人，依然在受“过日子”这套生活伦理的隐秘影响。